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二)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上)

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
中共党史教研室

1981.8

目 录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摘录).....瞿秋白	(1)
周恩来同志关于党史的报告.....	(6)
往事回忆.....彭德怀	(27)
中央通告(十三号)关于叶贺失败.....	(56)
张国焘报告.....	(66)
“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李立三报告	(71)
张太雷报告.....	(88)
周逸群的报告.....	(92)
国焘致扩大会议函及中央复函.....	(100)
高语罕给中央的报告.....	(110)
八一起义.....陈 毅	(115)
关于湖南秋收暴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任弼时	(129)
德兄并转军中全体同志.....	(133)
陈赓关于广暴的经过报告 27. 12. 25	(144)
参加广州暴动工作报告 1928年	曾干庭 (145)
广州暴动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邓中夏	(147)
广州暴动及其准备.....黄 平回忆	(164)
广州暴动.....黄 平回忆	(183)
湘南、湘东、赣西革命势力之扩展.....觉 哉	(192)
江西革命斗争中的几个问题.....访陈 毅	(200)
中央给前敌委员会的信(1928. 6. 4)	(209)

中央致四军前委信（1930. 4. 3）	（225）
中央致四军前委并转三、四、五军总前委的信 （1930. 4. 26）	（228）
湘赣工作座谈会任弼时同志的总结（摘录）	（229）
湘赣根据地革命斗争回忆	（239）
渭华起义	
回忆平江起义	滕代远遗稿（266）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摘录）

瞿 秋 白

（略）……

于是七月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令其党员退出国民党政府的宣言发出了，那时政治局已经最后决定缩小，付其职权于推定之五人临时政治局（国焘、维汉、立三、恩来、太雷）

共产党遵国际电令退出政府，同时国民党七月十五日的分共会议也开了。武汉的反动已经开始，何键已经动手拿共产党，他们的兵士“示威游行”，群众丧失了“头脑”，他们的“头脑”是自己渐渐的掉下。共产党中央最后的宣言，只是从掉下来的头所发出的惊人的呼喊。但仅仅只是呼喊。王荷波同志说：“我们工人看了这宣言虽然还未扬眉，但是吐了一口气——晦气。”

此后，中央经过了一个散乱的状态，转到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八七会议（这时期的详情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在汉口）。八七会议，其所谓接受的遗产太坏了。八七会议之前夜，中央经过一时的犹豫，决定要召集紧急的中央全党会议。但是，因为当时交通困难，时间迫促，所到不足人数，只有湖南代表及尚未赴沪的新书记邓中夏同志能来。这会议是有国电令及新国际代表的指示而召集的。虽然人数不足（中央委员13人，候补3人，青年团中央委员5人，地方代表2人），不能作为正式的全党会议，但是因为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之紧

迫及改变党的路线之重要，决定宣布开会，作为中央紧急会议（并非什么“改组会议”）并预定改选中央政治局，作为临时政治局。八七会议之前，中央即：（一）决定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的计划；（二）决定叶贺南昌暴动之举行；（三）发布中国共产党告国民党同志书（七月廿九日）。这已经是新的路线，主要的意义是发动湘鄂赣粤的群众暴动，重新团聚已受很大损失而散乱的革命力量，发动共产党员军官之下级军队独立奋起与国民党左派军队（贺龙）共同反对国民党的武汉中央及蒋介石、李济琛的统治，以革命的政纲号召左派国民党群众起来共同奋斗。这是八七会议之前夜。

第二节 八 七 会 议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反机会主义斗争的新纪元，新的策略路线，方才正确规定出来。但是有两个缺点：（一）因为土地党纲的始终没有确定，始终没有明晰的对于中国封建的亚洲式的生产之土地的特殊制度之观念，所以关于“没收大中地主，对小地主则增租的策略是模糊的，使地方党部往往仍继续对于土地革命的观念，认为农民自动的没收小地主时，党的任务仍是应当加以阻止，虽则八七会议对于这一点很明显的规定出来。（二）因为对于国民党左派群众，号召其反对宁汉反动中央在当时是必需的（南昌暴动发难期间），于是这种行动政纲过于伸张，而根据之来决定暴动的政权形式问题，仍认为“革命的国民党的这种组织，可以使将来革命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时，政权形式将要进于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那时的过渡更容易些，更没有流弊些”。这当然是不对的，可是，八七会议始终有极重大的意义，当时的共产党简直在溃散的状态之中，他将党救出来；他先是

洗刷旧的机会主义，建立新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的第一步，没有他，共产党简直就要“亡党”的。八七会议改造五次大会的中央政治局，发出告全党同志书，将机会主义的错误都明显的无所隐藏的指摘批评出来，这在政治上组织上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政治纪律的执行是极严厉的，他要求旧的中央政治局承认这种严重错误。这会议开辟了共产党的新生命。会议上决定党对于农民土地革命及职工运动的新路线，决定党的组织问题的新方针。会议批准七月二十九日告国民党革命同志书的政纲（会后即由临时政治局根据之而决定政治任务案），这些不但是纠正旧的机会主义错误，并且是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党自七月十五日之后公开的竟成绝对秘密的新环境，关于这一点也是不能忽视的。

八七会议之时，第一便是领导武汉工人以总同盟罢工反抗汪精卫的反动政府“改组”工会及民众团体（七月三十一日军警枪杀汉口车夫。八月三日宣布总罢工）；第二便是指导贺龙军队的南昌暴动，八七会议之后，南昌军队日前进到江西边境，交通与中央隔绝。中央的指导只能经过广东的南方局。另则，当时中央在全党散乱之际，又遭着严重的白色恐怖，许多小资产阶级的分子脱离；对于全国需要重新的大整顿，组织工作极其艰难而重要，中央尽自己的力量派许多新的同志到各地去指导，传达八七会议的新决议。同时，决定暂时留武汉指导两湖的秋收暴动。

八七会议之后不久，武汉的国民党政府之“东征”变成了“宁汉妥协”。中央就发布告民众书，号召工农兵士民众以及国民党左派群众起来反对这个反动中央。从这时候起，到叶贺汕头失败是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之中，中央继续的对

党内实行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机会主义是有很久的历史性，而且普遍于全国各省党部，不去掉这许多余毒，党的新策略是不能切实的执行。这期间，第一是叶贺南征的问题，叶贺南征是八七会议以前很久就决定的。当时，已经决定取消叶贺军中的“国民党中央里的共产党党团书记”谭平山之职，使他不能以此名义而为军中的最高指导者；另行指定前敌委员会，以恩来为书记，平山不加入，并在七月底派张国焘同志为中央代表，去军中督促军事，然而叶贺南征中，曾经有许多机会主义的余毒爆发，最先是国焘同志为联络张发奎问题而踌躇动摇。可是前敌委员会始终决定起义，叶贺南昌暴动，在历史上的意义是伟大的，因为他是代表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群众，共同反对陆续背叛国民革命宁汉中央之最后的奋斗，因为这是真正的奋斗。但是我党在军中的指导机关与中央的指导隔离，仍旧余留着“国民党主义”的毒。这也是使失败的原因之一，军队到潮汕之间，工农群众说“这是蒋介石的第三军队”这还是要“耕者无其田”，为什么，因为一则军队中指导机关提出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二则军队并不勇敢的镇压土豪劣绅工贼。叶贺南征之中，政策的客观倾向是继承国民党的革命方法：（一）纯粹想靠组织好的军队力量取得地盘和政权，（二）以“王者之师”来解决民众，实际上是以仁君易暴君的办法，所以对于“安宁秩序”只是保护豪绅统治的旧秩序，（三）是偏重于用联络杂色军阀——某种军队或武力，勾结敌军的军官倒戈（并非鼓动兵士）之投机办法。总之，是不发动群众，不相信群众。中央对于这些错误的指正，因为交通的阻隔，一直到失败之后才得到前方报告而详细报告全党。但在中央八七会议之后，便

早已对于其他各省有类似的指示，例如江苏及湖南。

（下略）

抄自《党史资料》第四辑
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编

1952. 12

周恩来同志关于党史的报告

六大决议案包括着：对中国革命的方针，对于资产阶级的方针，和当时的情况等等。六大我亲自参加过，要用历史的眼光去看问题，要用历史眼光和今天的眼光配合起来研究。

在六大召开前，共产国际召开过第九次扩大会议，即在广暴后两个月召开的（1929. 12. 11），这次会议决案是中国党六大以来一个指导方针，对中国革命和中心问题都回答了。这个决议是斯大林亲自参加的，参加签名的有斯大林、布哈林，中国党有向忠发、李立三，从文字上看来，好象斯大林起草的、或者是经他修改的。六大总的方针是包含这个东西的。但是在坏的方面是发展了，这个决议案有十一段。

一、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当时中国同志是不了解革命的性质与任务的，任务是由革命性质决定的，曼努意斯基批评说，共产党到现在才可以看到过去的错误，也就是这个道理。

关于建立政权的阶级性的基础，当时提出工农民主专政，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其基本力量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搭了一股子，甚至部分地主也进来参加。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实行民主革命。国民党是用反帝的口号，一直到叛变了，也不愿放下这个口号，一直到南京。

“二五”减租在大革命失败后，虽然有部分地方实行了。国民党到南京后，在广东取消了，在两湖取消了，仅在浙江几个县，以后国民党政府也取消了，所以连改良也没有，军阀战争还加深了封建关系，张发奎和李济琛的战争，把李也推翻了，李与陈济棠合作，把张发奎又赶到广西去了。

1927年11月扩大会议对中国革命性质的估计是错误的，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实际是托派的观点，当时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提的，这个家伙以后是反革命。

二、革命的动力，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当时国民党反革命，资产阶级是站在国民党政权方面，跑到反革命那边去了。他们反对工人运动，反对农民运动，也反对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资产阶级也是反对的，当时也没有看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好的，所以革命的动力认为是工农，小资产阶级。

孙中山的同盟会，宋教仁的中华革命党，以及后来的中国国民党，总裁制度，领袖制度，是向欧洲资产阶级政党学的，也有几派，立法，司法，行政分立等，国会也要委员会制度，各部分权。

国民党章的民主集中制，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结果，第一、二次代表大会，武汉三中全会也是如此，以前国民党也叫民主集中制，是假的，胡汉民早就说过：“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国民党的组织形式，政权，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所以说1924~1927的大革命，国民党是受无产阶级领导的、虽然有时没有整个的受我们的领导，在“三二〇”以前，是我们领导的，在武汉后期我们放弃了领导，罗易把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给汪精卫看了。

六大叫代表会议共和国，抗日叫民主共和国，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众的政权。

反革命内部矛盾，对革命是统一的他们内部是不统一的，不一致的，但是当时决议案上说，他们对革命是一致的，是错误的。

三、革命形势。朱总司令的军队由三河坝向井冈山汇合，方志敏当时是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委员，还有邵式平等在赣东北搞农运，南昌暴动失败以后，贺龙同志用一把菜刀也搞起来了，在广州朱昌群也搞起来了，广西有韦拔群和红七军张云逸同志会合，所以当时革命低潮不是压下去了，而在农民中有革命的予兆，这是一个特点，另一个特点是军阀战争，反革命内部不稳定，革命正要走向新的高潮，1930年立三召开的苏维会，各地代表都到了，根据这代表会议结果更扩大了立三路线。

革命高潮的征候是在农村，但说全国高潮是错误的。

四、中国革命的特点，发展是不平衡的，一个是地区的不平衡，一个是工农群众运动不平衡。

五、策略任务，策略路线。因为低潮，走向上升的高潮，策略任务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准备暴动在我看在总的方面是对的。

六、群众工作。加紧工会、农会工作，工会任意日常工作，反对强迫命令，但这方面不很深刻。中国工会有的特点，就是租界多，所以工会基础在1927、28年，不是突然一下就垮了的，但主观上强迫命令，那时分配各乡村暴动，城市中就罢工响应，工人受压迫，甚至广大工人不起来，我们做工作的同志，则使用恐怖方式，有的领导同志开始示威，

强迫暴动，否则就是这个工厂的工作同志不了解斗争，工厂是命令式的发动群众，不是群众自己起来要求罢工，而是由党支部会决定罢工，所以是恐怖式的命令，强迫式的罢工，因此，工人便离开了工会。这样除了我们在内部力量大，时间长的地方有工作外，其他被削弱了。

在1927、28年，黄色工会还没有象以后那样，所以当时如果无错误，是可以保存的，到后来，国民党把铁路海员，邮电务全国性的三种工会拿去了，其他工会也逐渐拿去了，但是纱厂的工会，在武汉广东的职工会，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工会，是没有拿去的，有些地方不是国民党领导的，也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我们自己保有一部分，国民党也有一部分，在群众中有些黄色工会，对国民党不愿他领导，也有些黄色工会的领袖不愿国民党领导，也不愿我们领导，在上海广州暴动就有这样的情形，国民党是警察式的领导，当时如果依国际的决议，凡是有群众的地方都加进去，不管是黄色工会也好，应都加进去。

七、反对盲动主义，它把反对盲动主义的结论，归结于组织主力红军，当时看成高潮，军阀战争的危机，农民运动不看成尾声，所以对还存在的农民战争，就说一直高潮，盲动主义在十一月会议以前就有了，如湘南事件，实际上城市中应该退却，在乡村中在有利的条件下，可以发动，在不利的条件下应当退却，如毛主席说：“井冈山在军阀战争的情形下可以发展，军阀停止时，来包围我们时，就要逐步发展，波浪式发展”。

在十一月会议前，盲动主义最典型的是广东，武汉是很严重，广东党留下来各级同志很少，只有区大姐，柯柏年同

志。

正确的认识广州暴动是退兵一战，打掩护仗。但立三到上海检讨时，他认为广州暴动是完全可以胜的，说领导者错误不是不善于退却，而是不善于进攻。没有打到湖南区，他认为有力量可以占领广州，有力量可以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所以他对广东领导者实行惩办主义，他的政治资本是十一月会议决议，在十一月会议上立三受到处分的，但他到广州去却处罚别人，除了张太雷同志死了外，全部受到处分，有些同志不服气，向上级告状，他就来一个充军，派广州去，如周文雍同志，是在广州兵工厂工作，还有关易、王××（是周总理秘书），海陆丰的失败，彭湃同志的牺牲，就是因为受到十一月决议立三路线的结果。那时很左，很多地方用烧杀的办法。知识分子的损失也最大。广州暴动后，有一千多人退到海陆丰，本身有七八百人。当时这个教导团的系统，是武汉黄埔军校的学生，知识分子集中在学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

徐向前同志在海陆丰，他当时不在教导团，当时围困在海陆丰彭湃同志接到信说：“知识分子革命性已完，硬是叫他们去当兵，很可以当干部的，也要去当兵，结果是硬当兵，一个个牺牲了”恐怖政策，地方保守观念，也很典型，海陆有些地方不能占领，他们就没有出兵，这当时中央退到五华，古大存到陆丰去请他们，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出来，彭湃同志说，战士不肯离开，另外还有流氓习气。

井冈山是成功的，当贺诚代表长江局去巡视湖南，王××到井冈山巡视，一定要准备打湘南，毛主席反对，把他们碰回去了。

立三当时代替代英同志工作，立三给代英的信叫继续搞，代英回信没法子搞，或者只照旧办法烧村子，立三说对，村子烧了大家叫无产，再上山，这就更加脱离群众，有一条枪一把刀要暴动，又没有配合，各搞各的，没有组织。

八、强调巩固党的问题：①巩固本身和它的干部。②巩固党中央。③巩固党的影响，使群众团体巩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残余，主要危险是“左”倾盲动主义，盲动主义到八七会议，十一月扩大会议后，已扩大到全国范围，广东、江苏，两湖都有，北方农民运动，冀东不善于退却，把一切干部都暴露在外面，谁要是提出调动工作，都说不对，不保护干部，后来也要张皇的，这样使我们斗争很困难。

九、反对所谓新的党，特别指出改组派，即改良主义的党，或者是第三党。反革命派别，要改良派与第三党区别开，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当时对我党有破坏作用。

第三党是共产党一部分人，国民党一部分人，他们对蒋介石，汪精卫不满意的，表示信仰孙中山主义，如邓演达，宋庆龄，共产党方面去的是资产阶级眼光，保留机密，对党不满意，这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从党内出去了，他们的成立就是吸收我们党内一部分动摇分子，起动摇我们党的作用，所以我们要反对，以后他们在反战上和我们相同，和我们合作，1933年邓演达从德国回来要和我们谈判，我们拒绝。谭平山在福建事变中，他要同我们联合，我们没有同他们联合是错误的。

邓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一直赞成土地革命，大革命失败后，由顾问台多里带去，台是反动的，把他带坏了，宋由鲍带去。

谭平山是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上打击他，开除了他的党籍。在南昌起义时张国焘动摇，谭平山主张把张杀掉，这是一个错误，罗明那兹就说不该开除。

关于改组派，汪精卫在武汉就杀人，到广州暴动汪更杀人，他是反工农的，改良是欺骗群众的，我们在思想上应该反对他这种欺骗，对他斗争当时也是需要的，到以后，改组派因为不在朝，就变成反对派。到广东广西的军队失败后，改组派就成为反动军队的反对派了、特别是1928~1929年上半年，把他同蒋介石比起来，是反革命内部的反对派，利用反革命内部的矛盾力量，是利用革命的间接后备军，以后条件变了，情形就不同了。

第三党同改组派是不同的，第三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它有点：①始终没有掌握政权。②它没有直接屠杀工农。③对共产党尽管他是反对的，但还只是批评的态度，没有屠杀；而改组派到广州暴动及以后，就亲自屠杀工农，屠杀共产党员，它是反革命的。不过到了以后成为反革命的反对派，这时情形又不同了。所以当时共产国际指示反对他们是对的，以后我们党说这个为主要危险，说比蒋介石还厉害，这是本末倒置的。说他象欧洲社会民主党一样，它要争取群众，妨害革命，但它没有这个作用。它是资产阶级的党，阶级性限制，所以他是宣传改良，而实际行动，没有改良。在当时他却是分裂我们党的作用，以后就没什么了，还有改组派是专搞军事投机，而不做实际工作。

十、对广州暴动的估计，当时称赞得好一点，但也批评了一些错误，在检讨错误时，对于广暴，共产国际有很大争论，三种意见：领导广暴的罗苏曼，他是德国人，跟罗明那

兹一起来到中国指导“八七”会议的，以后罗明那兹把他派到广州领导暴动。后退到海陆丰他同罗明那兹一样的思想，说中国革命是不断的革命，这个人是盲动主义者，以后德国党也搞得一塌糊涂，国际从六大到七大，他是宗派主义、盲动主义、小资产阶级狂热病，以后甚至当了叛徒，成为法西斯在我党内的奸细，以后证明是反革命。他不赞成说广暴有错误，不承认有错误。另外有右派反对广暴，有美国党的培培尔，是美国党的右派，六大后与布哈林一起，当时他到中国来考察，经过上海，他没有参加广暴，碰到过参加广暴的人，就随便谈一谈，他没有到广州去，他就反对广暴。还有中国的立三，他说广暴军事是错误的，把参加军事暴动的领导者都受处分，这并不是争论问题的中心，问题的中心是广州暴动，决定打掩护仗、决定再拿起旗帜，给侵略压迫者以反抗，把许多革命者从监狱中抢出来，把我们的力量退去，这个意见当时就没有争论。当时叶挺的意见是正确的，他对中国革命几个关键都是有贡献的，是人民英勇的革命家，但当时不相信他，因为在大革命前他是在国民党这边工作，还有叶剑英，当时张发奎要给他教导团，结果党不让他工作，认为他刚入党，到暴动前夜，才把叶挺从香港请来，到暴动第二天，他就主张退却，从东×罗博方向退却，这是对的，可是上级不采纳，叶挺是总司令，领有一团兵力，但罗苏曼说他是动摇，弄得他不能说话，叶挺仍然是跑出来到莫斯科去了，在那里就有人要惩办他，徐一新在那里，有些同志要审判他，他与宋庆龄是朋友，他也没有加入第三党，保护退却，没有（下缺字）

十一、各国兄弟党帮助中国革命。当时新的托派说中国

革命已经消灭了，共产国际对这点给以严厉的指责，说明并没有消灭，并且正走向新的高潮。

第二部分：六大以前中国阶级关系的变化

许多同志说：“汪精卫是小资产阶级，蒋介石不是民族资产阶级。”从六大以后，甚至共产国际也是这样说的，现在我来对阶级关系变化试说一点意见。

第一，大革命时期的阶级关系。从1924—27年的大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军阀，因此他就是革命对象。站在革命方面的是四个阶级，即工、农、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反革命方面是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但是资产阶级有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它也不是革命动力。但是从整个革命来看，因为买办阶级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它是不可能反对帝国主义的，但在抗战中，个别的买办参加抗战，甚至个别地主参加抗战，但是当时的买办，大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大革命时期的主要火力是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不是立刻把帝国主义赶走，而是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因此，当时南方的买办也会参加革命，但不是革命动力，当时南方的军阀是受压迫的，他们还没有取得全国的政权（如北洋军阀代表曹、吴、段）。南方国民党代表胡汉民、蒋介石、谭延闿（是湖南地方代表）参加革命相当长。一直到武汉。在北方的地主，买办也各有一部分在野派，并不是所有的地主买办都有权的，如北方的冯玉祥，他是北洋军阀，虽然他的阶级是中小地主。又如代表地主的郭松龄倒戈，反对满洲张作霖的统治，把北洋军阀动摇了。南方虽然有的地主也参加了，但也有反